

对七大之前毛泽东思想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

江泰然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 南昌 330003)

[摘 要] 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和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三个时段:1938—1941年为最初萌芽期,1942—1944年为基本形成期,1945年为正式确定期。七大和七大之前,常常是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当作同一概念来看待和使用的。真正分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这两个不同概念的,是1977年以来邓小平等的一系列论述和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键词] 七大;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思想;形成;评价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487(2007)08-0011-05

七大之前,甚至七大,人们在提出、概括或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常常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毛泽东的思想或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来看待。直到1977年邓小平等的一系列论述和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诞生,才从根本上分清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这两个概念。本文拟对七大之前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作一历史考察。

一、七大之前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三个时段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与这个理论的发展过程相适应,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提出,也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酝酿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作一简要的梳理。

(一) 1938—1941年为最初萌芽期:毛泽东思想主要指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1](P534)}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七次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思想原则。

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提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我们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2](P501)} 7月13日,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一文中指出:“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3](P220)} “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是我们党的一个极大的工作。^{[3](P222)} 九、十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检讨过去的路线问题,与会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都作了高度评价。如: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李维汉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2](P501)}

(二) 1942—1944年为基本形成期:毛泽东思想主要指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中指出:“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同一天,《晋察冀日报》的社论《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20世纪中国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的、强有力的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指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

[收稿日期] 2007-05-18

[作者简介] 江泰然(1963-),男,江西鄱阳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科研部副主任,教授,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共领袖人物生平 and 思想的教学研究工作。

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8月2日,周恩来在演说中提出了“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41](P138)}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说:“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45](P88)}

1944年7月,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上发展起来,继承了中国革命百年来的历史传统而民族化了的思想”;我们党“是以毛泽东思想为遵循的方向”。^{[2](P506)}

(三)1945年为正式确定期:毛泽东思想完全等同于毛泽东的思想。

1945年3月31日,刘少奇在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准备提交七大的党章草案时说:“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串,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6](P463)}

经过六届七中全会的酝酿和讨论,1945年6月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7](P175)}

通过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形成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从1938年10月到1945年5月,除毛泽东本人在他自己的论著中没有明确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或毛泽东思想外,其他领导人、理论工作者以及报社社论都有上述种种提法,其中,最早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的是张如心,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的是晋察冀日报社论,最早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的是刘少奇。我们必须看到,最早具体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内涵的是王稼祥,最早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科学概括和全面论述的则是刘少奇。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不管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还是毛泽东思想,在那三个时段里,都只是指毛泽东的个人思想,这从刘少奇当时的一系列论述和邓小平后来的一系列讲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31](P334)}，“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

上。”^{[31](P335)}紧接着,刘少奇从九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的具体内涵。从内容上和逻辑上看,刘少奇所说的“著作”、“文献”其实是同一个意思,都是特指毛泽东撰写的或起草的。而从他报告中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31](P333)},也可以看出刘少奇所指的毛泽东思想还主要是指毛泽东的个人思想。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也说:“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8](P345)}这就更能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是长时间里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为毛泽东的个人思想而加以认识加以学习加以研究加以宣传的。

二、七大之前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从理论层面上讲,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所积累的独特经验,是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从实践层面上看,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所从事的历史活动,是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来观照,尽管毛泽东思想的最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但中共其他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

1. 所探索的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的成果,为毛泽东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在探寻并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后,就各自地在实际工作中运用马列主义观察一切,调查、思考、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探索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策略等基本理论问题。例如,中国无产阶级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自党成立以来,不少领导人都在探索。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周恩来等在他们的文章中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工农联盟和反帝反封建等问题有过重要的论述,还阐明了人民群众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当时也探讨了这些问题。他们的探索成果,最终为毛泽东创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提供了素材。

2. 所提出的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见解,被毛泽东吸收或概括到他的论著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朱德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和井冈山斗争时期,所提出的游击战的许多战术思想,包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都曾加以理论概括吸收。1929年秋,在周恩来主持下,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中不少重要的思

想内容被毛泽东吸收到他起草的古田会议的决议之中。刘少奇提出的关于白区对敌斗争的许多策略思想,毛泽东在《论政策》等文章中也加以吸收。又如,朱德关于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论述,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的论述,刘少奇和周恩来关于白区工作的论述,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等,有许多内容是毛泽东的著作中没有充分展开的。这些论述既贯彻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也同毛泽东本人正确地论述到这些问题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并且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观点,因而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2] (P509-511)}

3. 所讨论和形成的意见决议,不少是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文献。中国革命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党的许多领导人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先后走到一起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领导集体。朱德和毛泽东从井冈山会师后,就始终并肩战斗。遵义会议之后,逐步形成了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为主的中央领导集体;1940年前后,形成了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主的中央领导集体;延安整风之后的1943年,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为主的中央领导集体;党的七大,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主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之后,毛泽东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都经过了中共中央的集体讨论,特别是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其他重大决策,更是凝聚了中共中央的集体智慧。例如,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就曾经过了中央政治局的反复讨论研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和毛泽东一起切磋琢磨,并印发六届七中全会征求意见,最后由毛泽东吸取大家的意见修改定稿。

此外,中共中央一些总结革命经验、提出重大理论原则、制定重要政策的,在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文件和文献,也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同样发生过重大影响。正如叶剑英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9] (P517)}也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8] (P345)}

三、七大之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丰富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如前所述,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对它的形成、丰富和发展均做出过贡献。从七大及其之前的总体情况来看,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是除毛泽东之外对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做出贡献最大的三位。

(一)朱德主要从军事建设、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

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朱德对人民军队的建设、人民战争及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的论述是比较系统的完整的,这些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朱德非常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他反复强调党掌握人民武装的重要性。1931年7月,朱德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这是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文章进一步指明了红军的阶级性、党的领导、政治训练、军事技术、铁的纪律和集中指挥统一训练等问题,他指出:“创造铁的红军是目前党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0] (P1)}朱德认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红军的历史任务是夺得政权,建立和巩固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是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得到解放。这支军队应当无条件地置于共产党领导之下,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10] (P2)}为了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他反复强调政治委员的责任,并提出政治委员要由最忠实、最勇敢、最坚决、最有阶级觉悟的共产党员来担当。他很重视人民军队的政治教育、政治训练和纪律教育。朱德用兵的最大特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说:“一切最好的战略战术,都是实事求是,合乎辩证法的。他把用兵的主张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并指出“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10] (P168)}他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10] (P126)},是我军最早的游击战争思想。朱德还在许多讲话和报告中,强调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团结和瓦解敌军的重要意义,强调在军队中实行三大民主,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朱德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对于党的建设有许多重要的见解和论述。他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哪里?我说,就应表现为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三个方面的英雄主义,三个方面的模范作用。”^{[10] (P119)}这种革命的英雄主义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在统一战线方面,朱德也为发展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此外,朱德对党的经济建设工作极为重视,提出过许多主张。“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11] (P98)}可以说是朱德与毛泽东一起进行经济建设的最好说明,也是朱德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最好说明。他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也强调了加强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性。

(二)刘少奇主要从党的建设、经济建设和统一战线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认为,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是党的思想建设。

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应该自觉地去经受长期的社会革命斗争，并且在这种斗争中改造社会，改造自己。这也就是说要在社会革命斗争中改造自己。他还认为，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的修养是统一的。共产党员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同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密切地联系起来，绝不应该使两者分割开来。同时，他对党的组织建设也非常重视，特别重视民主集中制。他认为必须实行党内的高度民主，同时，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党的领导上的高度集中：既要反对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又要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刘少奇还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论述了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和方法。对党的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刘少奇在一些文章中也作了阐述，如《论党》一文中就指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3] (P319)}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3] (P332)}。刘少奇在军事建设方面，对丰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少奇对经济建设也很关心，并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他曾在1934年所写的《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一文中指出：“苏维埃企业与合作社企业的发展、巩固与生产力的提高，是直接关系于战争的胜利，关系于工农劳苦群众生活的改善，而且这是准备着将来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经济基础。”^{[3] (P19—20)}此外，在统一战线方面，刘少奇也有许多重要论述。他认为，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为着要建立与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无产阶级自己必须组织成为坚强的独立的力量，以团聚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使自己成为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坚。他认为，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错误的；在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自主和忽视争取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错误的。他对战略和策略的关系，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上层统一战线和下层群众工作的关系也作了阐述。

(三)周恩来主要从军事建设、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就深刻地认识到建设人民军队的重要意义。在结合朱毛红军经验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后，周恩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4] (P32)}为了发展红军，周恩来对红军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在《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对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群众工作，组织训练，给养经济和党组织建设等都作了具体阐述。他充分肯定了朱德、毛泽东关于以连为单位建立党支部，连以下建立党小组，连以上设营委、团委等组织的经验。认为红军中的党组织不应包办一切，要加强政治领导，进行组织纪律性的教

育，党的训练要多带教育性，“党训练、教育同志，应用浅近的理论，很容易明白的事实，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增进他们的革命情绪”^{[4] (P17)}，克服红军中存在的农民意识、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倾向。

周恩来作为党的卓越领导人，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有许多重要论述。他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他指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要使党布尔什维克化，首先必须从思想上加强建设。他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一文中指出，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意识，要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就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文章还在列举了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十种表现后，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一致奋斗的四个标准：巩固并扩大党内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发展党内政治讨论并提高党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促进党员职业化；改进支部生活。他也很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一文中，提出了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解决组织建设中的问题。周恩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对丰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统一战线，周恩来也有重要论述。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对统一战线内部的各阶级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斗争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4] (P2)}所以中国共产党应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他在七大上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还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参加。他指出，历史上的“左”倾和右倾，都是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不懂得争取这个领导权。右倾是放弃领导权，“左”倾是把自己孤立起来；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4] (P220)}周恩来对统一战线等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在许多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朱德在武装斗争、刘少奇在党的建设、周恩来在统一战线方面还形成了各自的体例和特色。

四、怎样看待七大之前及其之后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在七大之前领导人的讲话和论述中，其实都是指同一个概念。即使是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所概括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内容也还是指毛泽东的思想，并不包含其他党的领导人的思想。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概括为九个“关于”，这九个关于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及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

的理论 & 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 & 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 & 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 & 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 & 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 & 政策。^{[3] (P335)}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六个“关于”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并对毛泽东思想概念作了科学概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2] (P47)} 我们把刘少奇的九个“关于”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六个“关于”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在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的界定与阐述上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七大之前,甚至七大之后到党的八大,仍然存在着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是同一个概念的认识的情形,这是毛泽东在党内有着无与伦比的威望、地位与作用之使然。虽然从形式上说有不合理之处,但并不影响实际工作,更不影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实际指导作用,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不论是党内还是在党外,当时也没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问。而且,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12] (P535)} 树立毛泽东思想也好,维护毛泽东党的领袖地位也好,拥护毛泽东领导集体的核心也好,党都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并及时地发现问题,纠正错误。但是,八大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则被歪曲了,简单化了,形式化了,甚至庸俗化了。这就给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个结果,不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也不是党的其他领导人所愿意看到的。我们这里,当然不是去纠缠八大党章为什么没有写毛泽东思想的条文,也不是去探讨必须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的区别开来,而是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的不同而带来的结果不同的问题。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个人的思想,是不宜被认定为或看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党的指导思想只能是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认识必然带来这样一个启示: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以某个人命名的东西完全等同于某个人,如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完全等同于毛泽东的思想。道理很简单,前者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的指导思想;而后者则是毛泽东的论著,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此来解释八大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脱离健康发展的轨道就不会显得那么唐突了。

我们必须看到,毛泽东思想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处在一个不断补充、丰富和发展之中。我们也必须看到,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明确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思想纳入毛泽东思想之中,但他们三人(还有其他人)对毛泽

东思想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则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刘少奇等的界定或论述毛泽东思想的含义,当时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大可不必把后来的全党的认识又返回去安在刘少奇等人的身上。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在这个方面,要像毛泽东在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时所提倡的讲真话那样,他说:“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13] (P350)}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毛泽东方方面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并不包括其他人的思想。承认这个事实,既无损于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也无损于其他领导人对这一思想的概括和论述。只有将不同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置于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认识,我们才不至于产生不同时期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同等性的认识。只有全面地历史地具体地认识和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才能看清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的贡献,才能看清七大之前包括七大所界定阐述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内涵不完全等同于十一届六中全会界定阐述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内涵。毛泽东思想还会随着历史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 [3] 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 [4] 周恩来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 [5] 邓小平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刘少奇年谱 1898—1969(下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 [9] 叶剑英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 [10] 朱德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 [1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12] 逢先知, 金冲及. 毛泽东传 1949—1976(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 [13] 毛泽东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 王家芬